臺大歷史學報第 75 期
2025 年 6 月，頁 177–212

BIBLID1012-8514(2025)75pp.177–212
2023.11.30 收稿，2024.11.15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06_(75).0004

現代德國文化與自然
——20 世紀初大都會柏林為例

郭　秀　鈴*

提　要

德國人認為他們與自然間存在著一種特殊關係，這樣的思維不僅見諸中世紀傳說，也在現代以不同樣貌充分展現。現代文明進程中最受矚目的工業化發展，是一個不斷重新定義人與自然的關係的過程。17 世紀以降，普魯士在領地上成功填澤造地，透過現代工業科技整頓河流、森林、濕地等，以構築道路、橋梁、工廠、居所，「征服自然」，促成都會發展與商業利益。這樣的氛圍在 19 世紀初期，歷經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的挑戰與刺激以後，轉而成為保家衛國論述所擁護的環境保育或「保衛自然」訴求，並有效地以國族認同模式浮現，也是 20 世紀第三帝國納粹政治宣傳中不斷被挪用與再現的主題。這使得現代城市與自然間時而曖昧融洽互相依存、時而掠奪的緊張關係更顯複雜。20 世紀初期現代德國大都會裡蓬勃建設的建築叢林中，自然與城市的邊際線在都會史與環境史的脈絡下如何被定義？

關鍵詞：德國現代都會　都會綠地　自然　荒野　國族認同　自然保育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621301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 168 號；E-mail: hishlk@cc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自然還是荒野？都會史中的自然論述辯爭
二、城市、自然與國族認同
三、都會與自然的邊際線為何？
結 語

前 言

自然與人類社會、自然與都會文明間的關係，在西方文明中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議題。[1]而現代城市，由於人類的社會與經濟生活，乃至泰半現代知識的積累、科學與技術的發展皆發生於此，與都會脈絡相關的討論也顯得別具時代意義。西方系統性的知識建構與科學理性思維主導的都會規劃密不可分，不僅相互影響，也相互促成。[2]因此，與自然相關的現代知識建構，無論是認識、理解或者論辯，若置於現代都會脈絡下討論，可窺見其與常民近身且具普世性的文化發展與意涵。另一方面，隨著以科學知識、理性方法為原則的都市規劃理論，於 19 世紀末期以理想主義、世紀末救世主之姿迎向都會的殘破、貧病問題以後，都市規劃中的自然，其存在（或不存在）的方式，也進入了另一個層次和意義的討

1 1990 年代歐美許多哲學家與文化批評學者，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 1901–1991）、索雅（Edward W. Soja, 1940–2015）、哈維（David Harvey）等人，曾針對自然與人類社會間的關係提出深入討論。而法國後現代哲學家拉圖（Bruno Latour, 1947–2022）更曾在其廣受矚目的著作中大幅論述自然與人類間的關係（*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1991] 和 *Politics of Nature* [1999]），歐美相關論述在 20 世紀與 21 世紀之交，獲得人文社會科學界的關注與熱烈回響。

2 西方國家在 20 世紀中期以前，現代知識建構的機構，如大學、科學實驗室、博物館、醫院等，多半位於城市或大都會中。而都會環境中的民生重大難題，如瘟疫、霍亂、其他傳染病，好發於擁擠髒亂／不衛生的聚落中，也常成為科學知識邁進的關鍵點。Sven Dierig, Jens Lachmund, and J. Andrew Mendelsohn, “Introduction: Toward an Urban History of Science,” *Osiris*, no. 18 (July 2003): 1–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城市中的自然，已不再是不經雕琢的原始存在。[3]

19 世紀中期，德國因工業化而快速擴張的城市化過程中，自然和現代都會的關係，一方面在極致工業化後帶來的末世感中，自然與文化間兩極對立，生活改革的倡議亦甚囂塵上；另一方面，自然與現代都市間也逐漸形成了某種既競爭且合作的共存關係。德國自 18 世紀以降在科技與工業發展及國族建構歷程中，「征服自然」的概念從未缺席。一個現代工業國家，如德國的成形，在物質文明與空間環境上，不斷積極重新定義自身與自然的關係，包括透過現代工業科技整頓河流、森林、濕地等，構築道路、橋梁、工廠與居所，達成都會發展與商業利益的目標。在這樣的「現代」情境下，城市與自然的關係時而曖昧、時而緊張。本文欲探討的是：在德國現代都會蓬勃建設的城市叢林中，自然如何被看待？在貧苦大眾的生存資源、新興中產階級的較高物質生活環境，與民族國家的國族主義理念競逐之下，德國現代都會如何定義自然？從 17 世紀陸續出現的君王人造園林，到為中產階級規劃的現代主義城鎮中的「新建築」（*Neues Bauen*），再到窩居於都會邊緣區域的無產階級公園聚落（garden colonies），自然（無論是土地、土壤、其上種植的植物）如何被理解和展現？

本文試著觀察工業化後德國快速興起的大都會生活，並將當代都會菁英對此激發的思辯與討論，置入當代文化脈絡中加以理解與詮釋。從普魯士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將拓展疆域的野心與務實改善貧農生活的使命視為同等重要的那一刻起，日耳曼的山水、田園景致就已悄悄進入思想、詩歌、音樂、繪畫之中，與德意志

3 北美景觀建築師麥克．哈福（Michael Hough, 1929–2013）在 1980 年代一個為高中科學老師舉辦的工作坊中，談及自然與現代城市的關係，他將現代城市中可見的自然分成兩種：一種是有規劃、有整理、「系出名門」（“pedigreed”）的自然，如公園裡大片經常性修剪的草地、整齊生長、養分充足的花床與林木等；另一種則為隨機偶發式（fortuitous）的自然，如廢墟裡或因年久失修、或因自然風雨力量摧殘的園林硬體與植物聚落。見 Michael Hough and Judy Hanks-Henn, “Nature and the Ci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79, no. 7 (September 1989): 42–43.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常民的生活緊密扣連。在暗夜無聲的星光下、在高山冰湖水面上皎潔的月光倒影中，「自然」成為德國民族主義論述在視覺、精神與情感上堅實的依恃。從墾荒求生存，到歌頌自然；從克服自然險阻，到認定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與山林間的緊密鏈結，在工業都會化、商業蓬勃發展的城市生活中，更顯得彌足珍貴。這背景使得 18、19 世紀的園林規劃、19 世紀末的現代建築與花園城市運動等創作思維，受到藝術與建築界菁英熱烈擁抱，紛紛積極探討，並從事實驗性發展。

本文分別由「自然還是荒野？都會史中的自然論述辯爭」、「城市、自然與國族認同」、「都會與自然的邊際線為何？」三個面向，闡述現代德國城市與自然間的關係。首先，在與都會相關的自然論述中，人為填澤造地與保留既存荒野自然，德國人如何界定此二者的價值或關係？其次，在城市化都會生活樣貌中，擁抱工業都會發展與批判破壞自然兩派間的關係為何？兩方的立場又為何與國族認同牽扯不清？第三部分則探討都會與自然的邊際線，從為了改善現代都會生活的城市綠化與綠地規劃談起，凸顯綠地的擁有權與實質使用者間的社會階級性分野，探討公共空間（即中產階級公園綠地與城市邊緣無產階級占用的貧瘠荒地）使用權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君權瓦解以後，德國左派、右派政治衝突白熱化，都會空間與場域邊界的競逐，讓自然的實質存在與論述再次成為意識形態角力的舞台。在全球環境議題激辯無解的當下，本文試圖回到西方工業現代化後，大都會各式議題相互交錯的熱點——德國首都柏林，重新理解現代都會文化與自然間的關係。而綠化與環境保育，這些表面上看似文雅且無傷的「民族特性」，如何成為納粹德國民族意識賴以推廣的助手？[4]是此篇論文嘗試論述與解答的問題。

4 Franz-Josef Brüggemeier, Marc Cioc, and Thomas Zeller, eds., *How Green Were the Nazis?: Nature, Environment,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5), 4–5. 研究和詮釋納粹歷史，不該帶著批判、偏見與全盤否定的濾鏡，這樣的史學研究觀點在 20 世紀後半葉常遭遇政治正確性被質疑的困境，陷入「不批判納粹、即為反猶」的論述中。此種壁壘分明的二分法觀點，一直要到 21 世紀初期才逐漸鬆動，與納粹歷史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一、自然還是荒野？都會史中的自然論述辯爭

（一）填澤造地

17 世紀中期、18 世紀初受到啟蒙思潮影響的德意志區域各邦國君主公侯，多視領土擴張與人民溫飽為明君職志，因此，透過各種方式改善農地耕種條件和擴大耕植面積，成為首要任務，於是乎，德國人透過建築工程技術，大規模與自然爭地的歷史就此展開。以在德意志帝國統一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普魯士為例，此類功績又以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執政時期最為顯著。這位愛好藝術、文化且人文氣息濃厚的君王，與有「軍人國王」之稱、戰功彪炳的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性格截然不同，但他們最大的共通點，是對於自己治理的王國人民福祉有強烈的使命感。在腓特烈大帝承繼父親眾多未竟志業中，又以透過填土造地的方式，將位於布蘭登堡（Brandenburg）的奧德河（Oder River）西畔沼澤變成可耕、可牧之陸的工程最為艱難，這項工程也在完成後最受後世稱道。沼澤地作為自然的一部分，因其難以捉摸、無法測量入地籍、阻礙軍事活動等特質，被重視「秩序感」的現代德國統治者視為寇仇。政府因此大規模聘用和培育優秀土木工程師，透過築壩、排水、填土、人造林等方式，進行土地改良、征服蠻荒、主宰自然，這被視為明君之首要任務。[5]腓特烈大帝繼位後十年內開拓的耕地，為數十萬人以上的貧窮墾殖移民尋得生計。德意志地區也在後續百年間，透過工業與科技改造自然的工作從未停歇，諸如擴建運河、建造蒸汽船、水壩、道路、

相關的研究得以有進一步深層探討的契機。

5 David Blackbourn, *The Conquest of Nature: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6), 7. 此書之中譯本：大衛．布拉克伯恩著，胡宗香譯，《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新北：衛城出版公司，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橋梁，以科技、治理為媒介，擴張文明與城市聚落。[6]但這種用人為力量征服自然的計畫、強勢開發的政策，在 1770 年代以後，隨著啟蒙哲學家們的批判，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回歸自然」概念被引進德語邦國區域後，開始受到質疑。

著名的德國文人，如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克勞普斯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等人，都在作品裡表達對於人為官僚世界束縛的厭煩，與對野性自然的嚮往。歌德以感性的角度詮釋自然，視其為母性般的存在，擁有永不枯竭的能量，自然既能創造，亦能破壞；而且人類與自然之間並非對抗關係，人是自然（作為一個統合體）的一部分。[7]人類在自然中可以感受到安穩平和，這一點在其廣為傳誦的詩作《在湖上》（*Auf dem See*, 1775）中可見一二。歌德在詩中以大自然無私提供的養分和新血，來比喻他從中所獲得的創作靈感，並以毫不猶豫擁抱他入懷的母親來讚頌自然，船在湖心隨著船槳擺動徐徐前行中，感受到無比寧靜、極致美妙與平和的意境。[8]克勞普斯托

6 到了 18 世紀末期、19 世紀初期，普魯士區域的中產階級傾向於視城鎮周遭的低窪澤地為無用之地，既不值得大規模進行農耕，亦無它用，僅為貧窮階級聚居之地。不少具備科技開發與經營理念的中產階級人士，支持由澤地汲水灌溉旱地，並透過水力發電開發城鎮周邊沼澤、河川、運河，充分掌握完善內陸水文體系可為國家帶來的財富。Rita Gudermann, “Conviction and Constraint: Hydraulic Engineers and Agricultural Amelioration Proje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 in *Germany’s Natur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 Thomas Lekan and Thomas Zeller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34–35.

7 Ritchie Robertson, *Goeth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26.

8 歌德對自然千變萬化的歌頌與嚮往，在 19 世紀以後更是飄洋過海，在英國引發關注與討論，為英國的「自然」討論風潮增添了既豐富也讓人興奮的色彩。舉例來說，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曾在 1869 年 11 月 4 日的《自然》期刊（*Nature*）第 4 期刊登一篇他自己翻譯、名為〈歌德箴言〉（“Aphorism by Goethe”）的作品，內容以詩意滿滿的文字描述自然的母性、創造性，以及與人類緊密無可分割的關係。赫胥黎更表示，歌德此作品的文字如此優美，意境如此深遠，是英國的「腓力斯坦們」（Philistines, 指沒有文化修養的人）無法理解或望其項背的。赫胥黎的好友達爾文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克在其寫於 1750 年前後的詩作《瑞士湖》（*Der Zürchersee*）中，亦用類似的筆觸讚美自然的創造力，以及人類在阿爾卑斯山谷、雲海、森林、湖泊交錯間，感受到自然的野性、寧靜、安定與美好。[9]

（二）城市中的自然荒野

當人們提到城市中的自然，最貼近此概念的是都會叢林中能接近綠地的花園（或公園）。而花園和「荒野」（wilderness）本來應該是兩個對立的概念，畢竟花園是由「自然」轉化、馴化、有次序的人造場景。[10]中世紀時期德語諸邦區域出現的花園，多半是修道院裡為神父、修士與修女們提供自耕自足的場域，而此場域成為人、自然和荒野間轉換互動的媒介。美國環境倫理學者歐爾施雷格（Max Oelschlaeger）觀察到，根據中世紀的基督宗教概念，自然荒野必須被馴服，以臣服於上帝所建立的神聖和諧秩序之下，否則即為異端。[11]他並指出，文藝復興時期西方自然與荒野間關係發生重要轉變，這是歐洲人大量拓展，以文明收服荒野的年代；但就如同被歐爾施雷格稱為「現代主義冶金術」的現代化運動從未真正獲得成功，這個馴服自然荒野的行動也從未能完整執行。[12]文藝復興時期將花園視為「第三種自然」，[13]花園設計包括用科學與技術完成

（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在讀了他翻譯的歌德論自然詩作後，也同樣讚不絕口，深受感動。見 Thomas Henry Huxley, “Goethe’s Reflection on Nature,” *Nature*, no. 129 (March 1932): 425–26.

9 Roger Paulin, *From Goethe to Gundolf: Essays on Germ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21), 270–72, https://metadata.openedition.org/handle /20.500.13089 /4625.

10 Joachim Wolschke-Bulmahn, “All of Germany A Garden?: Changing Ideas of Wilderness in German Garden Design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Nature in German History*, ed. Christof Mauch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4), 75.

11 Max Oelschlaeger, *The Idea of Wildernes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Age of Ecolog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0–72.

12 Oelschlaeger, *The Idea of Wilderness*, 68–69.

13 在上帝所創造的自然、模仿自然的藝術之外的第三種自然。

臺灣人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人造山水、瀑布、岩洞、水流等，用以代表在人造環境中再現的自然荒野。[14]英國歷史學家西蒙・夏瑪（Simon Schama）在《風景與記憶》（*Landscape and Memory*, 1996）一書中，以其奠基於西洋美學與藝術史研究傳統的通徹理解，深入淺出地剖析工業化前後人類對於自然地貌、極致之美，以及社會國家間關係的理解與想像。夏瑪在討論景觀花園（landscape garden）中人造自然景致與荒野的關係時，特別提到了粗野不文明與自然荒野間容易混淆的界線。他以英國北約克郡霍華德堡（Castle Howard）的 18 世紀中期英式古典宅邸庭園設計為例，此時期的英式庭園移除造景規劃周遭的圍牆和圍籬，讓人造荒野與外面鄉間景致連成一片，居住於宅邸的權貴特別能享有毫無視覺阻礙的「自然」荒野景致，也就是「一種相當禮貌的粗野」（a very polite kind of rudeness）。夏瑪用這個比喻來說明大自然與文明創造的荒野景致彼此間的關係與意涵，恰如其分。[15]這也是 18 世紀中後期英、德、法等區域文人、藝術家與建築師們所崇尚的，「如畫般」（picturesque）與田園牧歌般意境的展現。

最能回應此類議題的，莫過於備受推崇的德國浪漫主義大師卡斯柏・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74–1840），其作品以崇尚反璞歸真、寄情自然，並在大自然中找尋極致崇高的美著稱。以畫作《風景與亭子》（*Landschaft mit Pavillon*, 1797）為例，它描繪了一棟座落於斷垣殘壁的圍欄中，以簡化古典希臘式風格建造的亭棚，畫中的建物被周遭覆蓋五分之四畫面的天空、綠地、園林所環繞，營造出一種自然與荒野並存的和諧感（見圖一）。此種宛如古典遺址般恬然自得兼具浪漫情懷的美感，展現了弗里德里希反對人造矯飾文明發展的典型 18 世紀「如畫般」意境。[16]在此作品中，弗里德里希透過斷垣殘壁與亭棚取

14 Oelschlaeger, *The Idea of Wilderness*, 76–77.

15 Simon Schama, *Landscape and Mem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538–39.

16 弗里德里希在安排畫面時，並非單純真實地「記載」自然，他常會為了達到視覺效果，更動或增減眼前所看到的自然景致／靜物，人物的出現與否，當然也是他審慎思考規劃的關鍵成分。見 Sabine Rewald, “Caspar David Friedrich’s ‘Window with a View’: A Mystery

臺灣人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代人物意象，表達他對自然與文明間可能存在的和諧關係。弗里德里希在其中後期的作品裡，逐漸將人物引進畫布，此舉相當程度上將客觀而遙遠的畫作觀賞者拉進畫布，對比出人的渺小，更直接傳遞了其浪漫主義畫風中聚焦於人與自然的關係，使其作品獲得更大的關注。



圖一　《風景與亭子》

資料來源：弗里德里希，《風景與亭子》（*Landschaft mit Pavillon*），1797，水彩，167 mm×217 mm，德國漢堡美術館。Image Source: Wikipedia public domain.

19 世紀中後期德語區域園藝設計師的設計概念，受英國自然庭園設計觀念影響至深。以德語區域「自然花園」（*Naturgarten*）概念的推廣者威利・朗格（Willy Lange, 1864–1941）為例，他便閱讀過愛爾蘭花園作家威廉・羅賓森（William Robinson, 1838–1935）的著作《野性花園》

Solved,"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134, no. 1070 (May 1992): 30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Wild Garden*, 1870）；英國當代備受歡迎的野性風格花園設計理念，也透過如朗格這般常在《花園世界》（*Die Gartenwelt*）等園藝雜誌撰文的景觀建築師，被傳遞到德語區域，並進一步往北歐與美國等地散播，造成廣泛的影響。[17]

二、城市、自然與國族認同

自然地貌（*Natur Landschaft*）作為家園（*Heimat*）的一部分，勢必被保護的概念，在德國由來已久，以森林、鄉土、自然、環境保育與國族認同間關係為題的論述，亦因此相當豐富。在整個 19 世紀到 20 世紀中葉以前，「綠色」（*Grün*）一詞具有精神象徵性，意謂著德意志民族的優越，如蒼翠鬱蔥的日耳曼，這是相對於林葉稀疏、荒野草原的斯拉夫。[18]與家園、國族的相關論述或討論，則常以萊茵河（Rhein River）為主題。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對德語區域的屈辱與擾動，可說是德語區域國族認同概念的濫觴，這也說明了為何萊茵河與其河谷在拿破崙戰爭後的 150 年間，成為代表家園、家鄉的德國身分認同之最高象徵。另一方面，就對自然的態度而言，在 19 世紀時，德國主流社會依然有一股相對強勢的科技改造環境觀點，認為「自然是我們的對手，必須被束縛、馴化、壓制、征服」。[19]德國 19 世紀的現代化過程中，從在高地山谷興建水壩、將河流截彎取直改變地貌，到將濕園排乾而化沼澤為耕地，進一步做為其他用地，透過工程技術征服自然的能力與成果，是德語區諸君侯引以為傲的治理成績。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同時，也有不少人質疑此類征服／改造自然的作法，他們以萊茵河的氾濫為例，指出治療措施可能比病症本身帶來更大的問題，或者批評人類不該改良造物者上帝的

17 Wolschke-Bulmahn, “All of Germany A Garden?,” 79–80.

18 Blackbourn, *The Conquest of Nature*, 9.

19 Blackbourn, *The Conquest of Nature*, 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創造等，也在信仰上、美學上、實務上等各方面提出問題。[20]

在自然與家園關係的重要性上，社會改革者法蘭茲・戈爾克（Franz Goerke, 1856–1931）提倡透過攝影紀錄並傳遞自然與科學教育的重要性，同時建立在地歷史。在一個文化史仍被視為業餘史學作品的年代，戈爾克即開始提倡將照片做為史料使用的意義，並致力積極培養青年世代的業餘攝影能力，以傳承自然保育、綠色使命，記錄德國偉大的綠色田園，以及代表德國民族性搖籃的草原、樹林與蜿蜒的溪流。（參圖二）

自然保育作家威廉・布榭（Wilhelm Bölsche, 1861–1939）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期受到英國藝術與工藝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及霍華德堡（Ebenezer Howard, 1850–1928）「田園城市」（Garden Cities）理念影響，提倡「回到自然」的生活改革潮流。[21]布榭為德國田園城市運動的倡導者，常以大自然間的生活、德國風景地貌的過去與未來等為題撰文論述。他在著作《太陽與日塵：宇宙漫遊》（*Von Sonnen und Sonnenstäubchen: Kosmische Wanderungen*, 1903）中，強調制定自然保育法令的重要性，並提到德意志自然山水浪漫而完美的面貌，如七山峰（Siebegebirge）、萊茵河景致、施佩雷河谷森林（Spreewald）等大自然千年才能造就的景致，一個愚人只需要一周的時間就可以毀掉。[22]此類對於自然的關切，在 19 世紀末受到都會中產階級的認同，在「家園保衛」（*Heimatschutz*）運動的運作下，自然不再與文明成敵對關係，相反地，此運動的追隨者在 20 世紀初期開始強調兩者必須積極對話，以創造出一

20 Blackbourn, *The Conquest of Nature*, 10–11.

21 Wilhelm Bölsche, *Das Liebesleben in der Natur: eine Entsickelungsgeschichte der Liebe*, online edition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21), ii–iii, accessed July 5, 2023,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270104#page/1/mode/1up. 雖然布榭未曾受過任何正式的自然科學或自然主義教育，但其著作泰半以自然史為主題，並致力於以動物學家、自然主義學者、優生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 1834–1919）的社會主義為基礎，推廣自然科學教育。

22 Wilhelm Bölsche, *Von Sonnen und Sonnenstäubchen: Kosmische Wanderungen* (Berlin: Georg Bondi, 1903), 9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新的自然生活方式。[23]到了 1935 年，在納粹政府執政時期，自然保育概念被制定為正式法令，受到國家級的重視；但與此同時，在納粹黨的政治宣傳機制運作下，此概念也進一步被等同於家國與國土保衛信念，用來強化其所推崇的右翼國族主義思維。



圖二 《老牧里茲的松樹林》

說　　明：法蘭茲・戈爾克，《老牧里茲的松樹林》（Kiefern bei Alt-Müritz），攝影，1898。這是刊登在 1903 年德國柏林出版的《攝影通訊》（*Photographische Mitteilungen*）半月刊中，用以說明攝影技法的作品。戈爾克的攝影展示了其對各種自然景觀的精細研究，以及對景致細節的敏銳洞察力。

資料來源：Paul Hannecke, *Photographische Mitteilungen, Halbmonatschrift für Amateur-Photographie*, Jahrgang 40 (1903), Rijks Studio（荷蘭國家博物館線上圖像資料庫）, 38–39, accessed Sep. 26, 2024, http://Rijksmuseum.nl/nl/collective/RP-F-2001-7-1184B-26.

23 Maiken Umbach, *German Cities and Bourgeois Modernism, 1890–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7–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的工業資本化社會變革中，自然與國族認同在德國現代都會文化中有著一定的分量。都會史學者傑佛瑞・威爾森（Jeffrey K. Wilson）的著作《德國森林：一個國家象徵的自然、認同與爭論，1871–1914》（*The German Forest: Nature, Identity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a National Symbol, 1871–1914,* 2016）提到，1873 年甫統一建國的德意志帝國，受到經濟蕭條的影響，許多人在擁擠都會裡生活困頓，社會革命的潮流風起雲湧，醞釀著隨時一觸即發的社會與政治變革；而在「國家統一」概念背後扮演著重要支撐者的中產階級，多數信仰自由主義，無論政治意識形態偏左或偏右，都對可能即將發生的社會革命感到不安，因此開始望向長久以來被視為德意志民族象徵的「森林」（也就是「大自然」）尋求解答。[24]國家與鄉土的結合是支撐國族認同的兩大基石，更是面對大眾政治的一道有效防線，因此「回歸自然」、「重回德國森林」等概念，被許多當時的中產階級視為工業德國混亂世道中的心靈救贖。

快速工業化後誕生的都會，承載著人們高度的期待，這些期待既是國家的、經濟的，也是文化與社會的。在此情境下，都會成了兩種迥然相異文化意涵的角逐場域：現代主義者看到了都會裡的資金、人力資源為科技現代化帶來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因為都會的擁擠、髒污、貧窮、犯罪率高而持負面評價的反都會批判，也甚囂塵上。[25]如同狄更斯

24 Jeffrey K. Wilson, *The German Forest: Nature, Identity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a National Symbol, 1871–1914*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4–6. 除此之外，關於德國森林、鄉土、自然與環境保育及國族認同間的關係，研究著作十分豐富，較完整的論述整理，請見 Thomas M. Lekan, *Imagining the Nation in Nature: Landscape Preservation and German Identity, 1885–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5 關於現代都會發展招致的善意與惡評，是西方現代都會發展史的經典爭議，美國的歐美現代史學家 Andrew Lees 針對相關當代文獻做出甚為徹底的整理與分析。後續相關著作中，Christopher Klemek 將大西洋兩岸對於都會化理論的對比和 20 世紀後半葉的演變進行論述和整理，再次確立此方向論述的普遍性。見 Andrew Lees, *Cities Perceived: Urban Societ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20–1940* (Brattleboro: Echo Point Books & Media, 2014; first edition in 1985), 142–48; Christopher Klemek, *The Transatlantic Collapse of Urban Renewal: Postwar Urbanism from New York to Berl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對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法國大革命的評價——大革命的發生對法國而言，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壞的年代，一個時代在政治、社會上的重大變革，不會全是正面效果。[26]同樣地，19 世紀後半葉德語區域的快速現代都會化，既是經濟與文化上最蓬勃的契機，也是對社會傳統與自然環境的最大破壞。環繞著自然議題，無論批判或擁護現代都會化發展的論述皆相當豐沛，且為後世對於德國大都會文化的理解與想像有著諸多貢獻。

（一）批判工業都會化派

19 世紀的西歐城市是現代性與進步概念的展示場，同時城市和自然也常被以人類身體的有機機制比喻，城市有如一個區域或國家的心臟，公園則是城市的「肺」，道路是輸送養分的「血管」等，而急速成長到讓人難以掌控的大都會，則彷彿是大自然的突變或怪胎。[27]此論述賦予城市中的自然綠地極高且正面的評價；對城鄉間人口移動造成的工業都會化地景發展，則是充滿負面批判。又例如威瑪時期（1918–1933）以柏林為發展舞台、極為傑出的奧地利表現主義導演佛列茲．朗（Fritz Lang, 1890–1976），本身雖是左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者，但他在 1927 年上映後備受好評的電影《大都會》（*The Metropolis*）中，各式摩天樓林立的都會叢林裡，支撐整座城市生產、位於地底下大型工廠內的內燃機，搖身一變成了上古埃及神話中的巨型怪獸，無情且野蠻地吞噬著形同奴隸的工人們；而這整座大都會最高點、摩天樓之頂，有一層樓是經營者的總部，頂樓則是供其子成長、娛樂的運動場，以及一個充滿各式植物與奇珍異鳥的溫室大花園。此部電影，以 20 世紀初期德國大幅度受到中產階級欽慕的烏托邦社群概念——如菁英治國、社群互助、運動健身、

Chicago Press, 2011), 25–28.

26 Blackbourn, *The Conquest of Nature*, 11.

27 Richard Dennis, *Cities in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s and Productions of Metropolitan Space, 184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接近大自然以獲得健康體魄等，作為故事背景，讓大都會成為充滿各式價值與寓意競逐的場域，對工業現代化提出犀利批判。

批判都會化發展的論述，有一大部分受到右派人士青睞，在 20 世紀初的國族主義運動中，以國族認同之名獲得廣泛重視並有效挪用，也是 1930 年代第三帝國納粹政府政治宣傳的重要主題之一。第三帝國時期，納粹黨內有一部分對於自然保存極為熱衷的派系，在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的支持下，於 1935 年 7 月制訂了以自然保育為目標的《帝國自然保育法》（*Reichsnaturschutzgesetz,* 簡稱 RNG），並規劃一系列的大規模綠化計畫，例如由納粹農業部長李察・達里（Richard Walther Darré, 1895–1953）領導的有機耕植，與景觀建築師阿爾文・蔡費爾特（Alwin Seifert, 1890–1972）的環境保育計畫等。在工業化正如火如荼發展的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此舉獲得各界矚目。就德國內部而言，長期以來德國環境保護運動者（*Heimatschutzer*）對於自然保育理念無法獲得重視感到挫折，如今以執行力著稱的納粹政府透過中央政府統一頒布法令，勢必可讓德國社會終於開始重視環境保護議題。

然而，後續的環保運動發展並不符合人們的期待與想像。主要理由如下：首先，表面上，納粹黨似乎是所有黨員服從於單一獨裁領袖之領導、政策明確統合的政黨，但真實的狀況卻是黨內各式意見雜陳，政令多半流於表面，形式意義大於實質內涵，與現實利益或務實目的不符時，多數政策隨時可以轉彎，而自然保育法與環境保護政策就是此類案例。在國家意識優先、「土地與血脈」的旗幟下，自然保育法被用來為納粹國族主義政治宣傳背書，強調保護德國原有的自然、家園、自然景觀（*Landschaft*），以確保德意志民族的存續與茁壯；但納粹黨菁英層級對於「自然」、「自然山水」等概念的定義莫衷一是。[28]

其次，獨裁政府雖具有權力集中於政府、執行力強的特質，但德國的環境保育運動者很快發現單一標準的政令缺乏因地制宜的彈性，根本無法解決區域個別面臨的不同問題。以萊茵河河谷區域而言，曾經一度

28 Brüggemeier, Cioc, and Zeller, *How Green Were the Nazis?*, 8.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德國環境保育運動中走在最前線的萊茵河環境保育者，面對第三帝國的環境保護法令，他們無法參與中央決策，意見被邊緣化，終在國家利益優先的口號下被犧牲。[29]

最後，雖然第三帝國將自然保育工作正式納入政府政令的舉措，在1930 年代的確是絕無僅有、走在時代尖端，但納粹黨對於其所頒布的政策往往配合國家重大方針（如國族主義、種族政策）而選擇性執行，且多數政策並未系統化落實，這使得自然保育的概念在 1930 年代末期快速地被模糊化、挪用，相關計畫終究在納粹的領土擴張野心與戰爭延燒下停擺。[30]納粹政權高階幕僚所理解的自然保育概念，目的在再現理想德意志「自然」風景，讓「整個德國就像一座花園一樣」，[31]展現出視覺上條理分明的秩序感與空間上潔淨而健康的生存環境，堪稱是「自然保育的帝國主義」；而荒野（*die Wildnis*）一詞被延伸運用到種族議題時，便暗含了種族上不精良的負面意涵，對於國族不僅沒有助益，更是必須剷除的危害。

（二）擁護都會與自然派

現代城市透過公園、湖景、草地、行道樹種植等工程，在城市中再造自然，而 19 世紀的畫家（如印象派）總能在城市中找到柔和的視角，在看似不經意的一筆中，用自然（晨曦、煤煙裊裊的車站、夜幕下的霓虹燈）打磨掉摩天樓或車站、鐵道等現代工業煤鐵結構所產生的銳利邊角。[32]德國藝術史家保羅・拉維（Paul Ortwin Rave, 1893–1962）在《論歌德時期花園》（*Gärten der Goethezeit*, 1981）一書的前言中，擷取了歌德

29 Thomas Lekan, "'It Shall Be the Whole Landscape!' The Reich Nature Protection Law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Third Reich," in Brüggemeier, Cioc, and Zeller, *How Green Were the Nazis?*, 93–94.

30 Charles Closmann, "Legalizing a Volksgemeinschaft: Nazi Germanys Reich Nature Protection Law of 1935," in Brüggemeier, Cioc, and Zeller, *How Green Were the Nazis?*, 33–35.

31 Wolschke-Bulmahn, "All of Germany A Garden?," 86.

32 Dennis, *Cities in Modernity*, 100–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闡述自然的十四行詩，以強調花園作為人和自然間橋梁的重要性。[33]此詩以「自然與藝術」為主題，深入描繪兩者關係，以及對於個人的同等重要性。強調自然和人類文明間細緻而感性的關係，是德國現代文化中的重要關懷之一。即便在高度工業化的威瑪年代，歌頌柏林這座城市的諸多文人，如馬克思主義菁英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就曾在其〈從自然風景角度看柏林〉（“Berlin, as Viewed from the Landscape”）一文中點出，柏林作為現代城市，許多建築或許隔夜便出現在眼前，但也可能突然消失；這時期的都會房舍，不像舊時代時那般隨著時間自然老化，而是往往直接變成廢墟。[34]布洛赫以這座城市從沼澤濕地成為乾涸之地以供現代工業建設的開發史為起點，觀察它在自然與人造自然交疊下所呈現的樣貌——從河渠、湖泊、森林、矮林到草地。布洛赫用一種詩人的眼光評價大柏林及周邊景致，他提到，在近千年未變的天候環境下，

33 Paul Ortwin Rave, *Gärten der Goethezeit* (Berlin: Henssel, 1981), 9. 歌德〈自然與藝術〉十四行詩：「自然與藝術，像是相互藏躲；在人們意識到以前，它們已經找到彼此……。這當真是種誠懇的努力，也只有在有限的時光裡，透過精神和勤勉與藝術連結，自然便能重新在我心中發光。」（德文中譯為本文作者譯，下同）原文：“Natur und Kunst, sie scheinen sich zu fliehen. Und haben sich, eh‘ man es denkt, gefunden; …Es gilt wohl nur ein redliches Bemühen! Und wenn wir erst in abgemeßnen Stunden. Mit Geist und Fleiß uns an die Kunst gebunden, Mag frei Natur im Herzen wieder glühen.” 見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Natur und Kunst,” *Gedichte 7 Nur die Besten*（德國線上詩集網站）, accessed Sep. 30, 2022, https://www.gedichte-lyrik-online.de/natur-und-kunst-sie-scheinen-sich-zu-fliehen.html.

34 Ernst Bloch, “Berlin, as Viewed from the Landscape,” in *Literary Essays*, trans. Andrew Joron and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1–62. 布洛赫也認為都會柏林堪稱中產階級大量出現的新文化殖民地，他們以消費取向為優先的物質生活型態，充滿算計的功利主義，人際關係的疏離和實用主義，把包括自身的一切都變成了機器；而都會柏林對於資本主義的快速變革毫無抵抗力，且社會中充斥廉價快速跟進的野心，這使得大都會變得低俗和充滿變數，表面上似乎快速發展，但骨子裡陳舊的思維和文化習慣絲毫沒有改變。布洛赫表示，自然裡的種種皆非永恆，而是變異的，就連現代人類在都市裡的足跡也一樣，終將如在柏林周遭郊區曾經是主流存在的農夫和大地主一樣成為過往。見 Ernst Bloch, “Beriln, Southern City (*Das südliche Berlin*, 1915–16),” and “Berlin after Two Years (*Berlin nach zwei Jahren*, 1928),” in *Metropolis Berlin: 1880–1940*, ed. Iain Boyd Whyte and David Frisb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46–48, 379–81.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柏林的自然景觀幾乎不變，不僅未喪失其自然特質，自然更以原料之姿存在於城市內部、在人文主義盆栽的土壤中、在工廠使用的煤礦中，以及在大地與林野之間。[35]

現代都會觀察者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在其著作《單行道》（*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1979）中，表達了大城市現代發展後，居民必須面對都會文明堡壘內部的不斷變動，以及城市與鄉間未被破壞的自然景致間的落差，他也常提及都會居民在晦暗、惡劣的境況下的不安全感。[36]班雅明觀察到城市和鄉間自然大地間關係的大幅改變，城市圍牆、高速道路、環城森林等，不僅劃出了城市的邊界，也同時凸顯了城外大自然的存在。[37]德布林（Alfred Döblin, 1878–1957）在其 1928 年發表的〈柏林〉（"Berlin"）一文中表示，相對於巴黎，柏林是個單調乏味的城市，不僅沒有大規模、系統性的規劃，也沒有受人矚目的耀眼建築，城裡到處是工廠和工人所居住的品質低劣住宅。他指出，表面上「柏林是德國的巴爾幹，嘗試模仿紐約和巴黎」，[38]然而城中的布爾喬亞（*Bourgeoisie*, 資產階級）缺乏同樣的氣質，展現出來的是各種錯誤和低俗的行為舉止。不過這座被自然森林所環繞的城市，最知名和珍貴的是它的無限動能，它會需要半個世紀、或者一百年來發展。上述作

35 Bloch, "Berlin, as Viewed from the Landscape," 363, 365–66.

36 "Just as all things, in a perpetual process of mingling and contamination, are losing their intrinsic character while ambiguity displaces authenticity, so is the city. Great cities – whose incomparably sustaining and reassuring power encloses those at work within them in the peace of a fortress and lifts from them, with the view of the horizon, awareness of the ever vigilant element forces are seen to be breached at all points by the invading countryside. Not by the landscape, but by what in untrammeled nature is most bitter: ploughed land, highways, night sky that the veil of vibrant redness no longer conceals." See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9), 59.

37 An Paenhuysen, "Berlin in Pictures: Weimar City and the Loss of Landscape," *New German Critique* 37, no. 1 (February 2010): 22–23.

38 Alfred Döblin, "Berlin," in Whyte and Frisby, *Metropolis Berlin: 1880–1940*, 379–81.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品的字裡行間顯現出對於柏林不失自然特質、與自然連結，且能達到自然與現代性共存而感到欣慰，視其為柏林城的最大特色。[39]這種對文化特色的認同被右派政黨挪用，導致後來的納粹黨成了德國最早頒布鄉土保育相關法令的政府，也推廣許多以大自然為友的有機耕植和相關政策。

三、都會與自然的邊際線為何？

2005 年來，歐美環境史的研究成果至為豐富，在許多討論中，它們與現代都會史有著彼此互補的跨領域共生關係。都會史探討現代都會文化現象，而環境史則討論都會周遭與人類文明相關的自然環境議題。根據德國都會史學家杜樂莎．布蘭茲（Dorothee Brantz）的定義，環境（environment）與風景（landscape）間的差異是：環境可以排除自然因子，亦即皆是「人為的、人造的」；而風景雖也有人工造景的可能，但其中必然包含自然。[40]所以，城市與自然的邊際線如何設定？城市中的自然，如公園、花園，該如何被看待？它們屬於自然，抑或非自然？這些環繞著自然、風景與城市景致（cityscape）的相關議題，都是環境史與都會史討論的對象。總體而言，都會史與環境史學家約莫可達成共識的是：城市不僅沒有與自然切割或「決裂」，相反地，它讓人們進一步更仰賴自然，例如都會所使用的天然資源自來水、天然瓦斯……等；同時城市的建設也必須考量當地的自然資源，如山川河流、港岸峽灣、土地、天候、空氣品質等。[41]此外，城市與鄉村的邊界也不是永恆固定不變的，反之，它會隨著硬體物質條件（如道路興建、地方政府規劃、天災地變等）

39 Bloch, “Berlin, as Viewed from the Landscape,” 365.

40 Dorothee Brantz, “The Natural Space of Modernity: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on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Historians and Natur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 Ursula Lehmkuhl and Hermann Wellenreuther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7), 201.

41 Brantz, “The Natural Space of Modernity,” 196, 205.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社會因素（如居民活動習慣、觀光客參訪頻率等）而不斷改變。

美國都會史學家孟福（Lewis Mumford, 1895–1990）在其 1938 年出版的《城市的文化》（*The Culture of Cities*）一書中，曾經將城市與自然的關係定義為一種空間與時間的藝術作品，它既像洞穴、鯖魚潮，也像螞蟻窩，是自然現象的一部分，也是有意識的人為藝術作品；換句話說，城市是人類思想、意志的具象展現。[42]孟福在該書 1970 年再版的前言中提及，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各大都會所造成的毀壞與廢墟，讓歐洲人們理解過度崇拜科技的現代文明走向的謬誤，但未經戰亂的美國本土人民卻相對無感，畢竟城市一直活生生且忠誠地記載著一個社會、一個文明的態度。[43]

（一）現代都會生活與城市綠化

19 世紀不僅見證了全球工業化與都會化發展，同時也是仿自然的新式都會空間大量誕生的年代，綠色空間如公園、動物園、植物園、水岸、綠蔭林道、與屋頂花園等。這些仿自然空間場域的出現，一方面有著教育功能，象徵帝國的殖民事業與知識建構；另一方面也與對抗空氣汙染、紓解都會人群精神壓力等新式健康概念有關，同時更是創造美感生活經驗、提升生活品質的中產階級文化發展的一部分。都會綠地設立的原意或許是娛樂休閒，但無論它曾經是為權貴階級設立的特權空間，或者在現代民主社會中為中產階級乃至更廣泛的大眾所使用的公共空間，抑或後續很快地成為犯罪和性工作等活動進行的公共場所等，這些不同面向的發展，[44]皆無損於公園在都會裡的綠化功能，以及人們嘗試在城市中再製或者保留自然山水景致的努力與意義。

總體而言，早期的德國園林，多半在形式上受到詩人、作家和哲學

42 Lewis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San Diag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5.

43 Mumford, *The Culture of Cities*, 5.

44 Brantz, “The Natural Space of Modernity,” 20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如歌德、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等文化菁英們的關注和討論，園林營造出的景致感受，往往是規劃設計的核心。在德語系區域，人造園林（或譯為風景花園，landscape gardens）是現代公園的前身，在七年戰爭結束（1763）之前並不常見，18 世紀後期陸續出現的人造園林多半以英式園林為樣版，除了是皇室身分地位與品味的展現，也是歐陸皇室間親族關係與政治連結的具體象徵。奧圖・馮・孟樵森（Otto von Münchhausen, 1716–1774）等 18 世紀的德國庭園設計師或植物學家們，多半並未親身造訪過英國庭園，他們仰賴友人見聞轉述，來揣摩與想像英式自然風格的花園設計。著名的英國庭園建築師雷斯洛・布朗（Lancelot Brown, 1716–1783）不僅作品豐富，聲名也遠播歐陸，其作品風格對德國影響至深。

英式庭園講究的自然風格、景致層次、如畫般的美學概念、哲學與文學意境等，都是德國園林建築師模仿與揣摩的面向。而源於法國、在 17 世紀引領歐陸的巴洛克或者洛可可風格庭園，則較強調幾何對稱形式、景致變換、氛圍的營造，以及與庭園周遭建築的搭配，此類設計特質對於 18 世紀以後的德意志區域皇室庭園，在硬體格局規劃與建築形式上亦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單憑當時的皇室御用建築師們有不少曾至法國遊歷或學習這一點，便可觀之。天候、植株和草地的養護、病蟲害控制、庭園坐向與光照充足度等園藝造景問題，在 18 世紀中期開始受到德國庭園造景師的研究與關注，庭園建築師不僅必須掌握上述植物照護屬性，也必須兼顧園林風格的設計。這些工作當然也意謂著需要對等資金的支持方能完成，但 1763 年以後的德語系邦國財政狀態並無法負擔，因此 18 世紀後期並未見此類園林大量出現。[45]少數此類庭園的落成，源於此時期較具實力的德語邦國多半與英國皇室為姻親關係，德系王公貴族常遊走於倫敦及其近郊宅第與德國之間，他們對於 18 世紀後半葉在上層階級間廣受矚目的英國皇家園林邱園（Kew Gardens）和里奇蒙園（Richmond

45 Marcus Köhler, “Brownian Gardens in Germany,” *Garden History* 44, supplement 1 (Autumn 2016): 1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ark）、以及權貴興建的布倫亨宮（Blenheim Palace）等相當熟悉且欣慕，不僅在回到自己的公國屬地後嘗試仿效興建英式花園硬體，同時也向英國皇家庭園交流特殊品種植栽，以營造出他們所嚮往的自然風格。[46]較為人詬病的是，18 世紀時期部分德語區諸邦諸侯王子們甘冒耗費鉅資導致民不聊生的罵名，將他們崇尚的英國皇室親屬庭園的設計在德國土地上拷貝再現，而最終的建築成品卻因缺乏原創性，而無法達成讓人們欽慕其王權的政治、文化影響力。[47]

（二）都會中綠地規劃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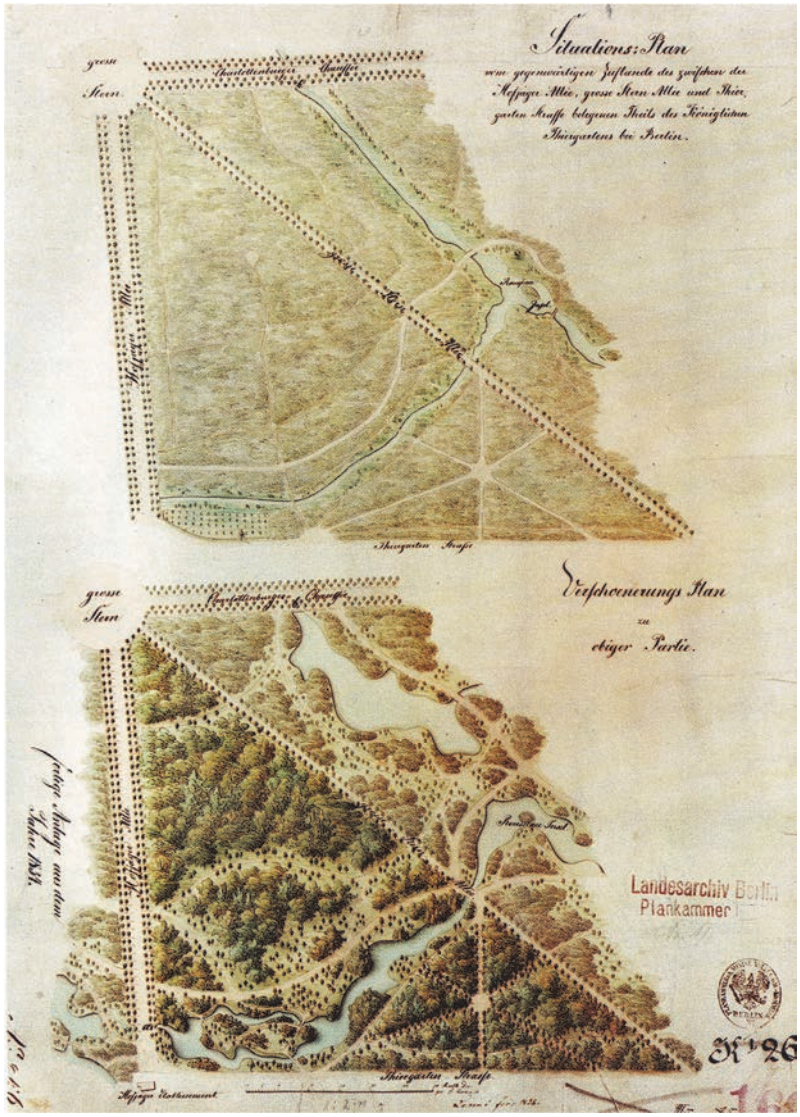
倫敦、巴黎、柏林等西歐大城在 19 世紀末具備的優勢，不見得可以複製在其他大城市，畢竟並非所有的現代都會都能有大面積的自然綠地，世界各地的大型現代城市在都會發展過程中，多數面臨與工業化、商業化區域爭地的窘境，在沒有足夠國家公權力（如舊有封建機制下的君王專用領地）、市政規劃政治力與資金挹注等條件的保護下，往往不敵工廠、商辦等建物的快速建置，與其背後工商利益的競逐，讓可供公眾休憩的公園綠地被破壞，或甚至完全剷除。這樣的例子，即便在發展指標等級較高的歐洲也比比皆是，如布魯塞爾、布達佩斯、維也納等。德國是較為幸運的，因為各君王與諸侯封地的傳統，他們在 18 世紀大量模仿法式與英式花園造景，而能為城市（多半是封建時期貴族封地的首府）保留了足夠的綠地，如位於柏林市中心的蒂爾加滕（Tiergarten）公園（見圖三）。

---

46 例如，英國的威爾斯公主奧古斯塔公主（Princess Augusta, Princess of Wales），她的兩位姪子（德國 Sachsen-Gotha 公國王子）曾在 1768 年到倫敦拜訪她，對於她住家所在的里奇蒙園之景致與氛圍極為推崇與欽羨；他們回到德國後，與姑姑通信討論如何在其屬地打造自己的英式庭園，包括由大英帝國首都倫敦的邱園引進各項稀有花卉植物、鳥類、觀賞用魚等。見 Köhler, “Brownian Gardens in Germany,” 163–66.

47 Köhler, “Brownian Gardens in Germany,” 170.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三　柏林蒂爾加滕公園內部獵人大道、大角星與蒂爾加滕街路段之改建規劃圖

說　　明：上圖為萊內著手從事改造規劃之初，此區塊公園的樣貌；下圖為萊內嘗試以最接近自然的方式拓寬河流水域，順勢加入湖泊、增植樹林的規劃。

資料來源：萊內，柏林蒂爾加滕公園內部獵人大道、大角星與蒂爾加滕街路段之改建規劃圖，1835，鵝毛筆、水彩，535mm×373mm, Nr. 26, A Pr. Br. Rep. 042, Plankammer, Landesarchiv Berli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蒂爾加滕公園由皇家庭園設計師彼得・約瑟夫・萊內（Peter Joseph Lenné, 1789–1866）規劃，在工業化與現代化過程中，逐步經過細緻的規劃與轉型，在都會中創造綠地、再現自然，巧妙地讓現代文明與荒野間構築出一片井然有序的休憩園地，是 19 世紀建築與園林規劃師在快速工業化社會中最具挑戰性也最具成就感的功業，從君主特權狩獵園林過渡成為讓中產階級有機會接近自然的休憩空間。

此外，大型公園作為公共空間，有著文化、社群美感形象、普魯士光榮歷史與國家紀念性等象徵意涵，對於公眾生活品質的提升，具指標性意義。[48]許多城市中的公園，初建成時往往在城市邊緣地帶的林地，但隨著都會化發展與城市的擴張，後續不僅成為都會核心的一部分，更是當地政治、文化與市民象徵之焦點所在。[49]

1. 中產階級與綠地－別墅花園

都會中產階級與綠地的關係，從宅邸內外的私有花園可見端倪。以普魯士為例，原本由萊內帶起的重視形式的霸氣風景花園設計精神，隨著他的過世，在 1866 年以後漸次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規模大幅縮小的都會近郊別墅花園，這與此時期大量出現的都會中產階級陸續成為此類庭園案主有關。

這樣的風潮在 1904 到 1905 年間，黑爾曼・慕特修斯（Hermann Muthesius, 1861–1927）的《英式房舍》（*Das Englische Haus*）一書出版後，進一步席捲德國。慕特修斯將其 1896 到 1903 年被派任到倫敦的德國領事館擔任文化參事期間，親身造訪觀察的英國居家環境與建築、大型皇家公園的所見所聞引介回德國，獲得熱烈迴響。慕特修斯的《英式房舍》含括中世紀到 19 世紀末的英國房舍，就建築形式、內部隔間與動

48 Elizabeth Heekin Bartels, “Berlin’s Tiergarten: Evolution of An Urban Park,” *The Journal of Garden History* 2, no. 2 (1982): 171.

49 Denise Phillips, “Friends of Nature: Urban Sociability and Regional Natural History in Dresden, 1800–1850,” *Osiris*, no. 18 (July 2003): 46.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線，以及相對應的庭園設計等進行觀察與分析，並另闢專篇討論時代潮流，亦即當代英國年輕藝術家帶起的藝術與工藝運動風格下的一系列建築與庭園設計。[50]關於花園形式的設計，慕特修斯反對為了在都會宅第裡再造自然而打造出來的迷你自然形式花園：「人們決定在住家花園裡以小規模的圍欄模仿大自然、未經雕琢的隨興樣貌，這樣的作法本身就相當不自然。真的想找尋自然的人會在其住家花園的圍牆外找到它。」[51]他認為花園應該是住家建築的延伸，在形式與功能兩者皆然，彼此間有著對應關係；因此廚房外緊鄰的會是烹飪用的香草與蔬菜花園，迎賓大廳外會是花卉花園等，而且花園裡的圍籬樹叢必須經常修剪，以維持庭園的空間設計。

慕特修斯從英國引進的一手觀察與概念，成為後續 1920 年代在德國開啟熱烈討論的「德意志花園城市」（Deutsche Gartenstadt-Gesellschaft）運動重要的理念根據。而其對自然與花園的重視，在德國建築與都會理念辯爭中，成為保守派與現代主義者逐漸成形且愈發強勢對峙勢力間的最大公約數。[52]

---

50 當時英國正興起重視家庭生活的物質與精神細節的風氣，透過藝術與工藝將工業進步帶進每一個英國人的家裡，慕特修斯對此一充滿理想性且進一步促進經濟蓬勃的藝術運動相當著迷。他完整報導了新一代英國建築師與藝術家的發展趨勢，從建築大師李察・諾曼・蕭（Richard Norman Shaw）講究復古、在地特色的典型英國房舍，以及其眾多優秀學生們，如威廉・雷舍比（William Richmond Lethaby）、恩內斯特・牛頓（Ernest Newton）等精心設計的英式花園別墅，蘇格蘭的查爾斯・麥金塔（Charles R. Mackintosh）的格拉斯哥學派（Glasgow School），以及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與羅塞堤（Dante Gabriel Rossetti）為首的前拉斐爾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藝術社群間所擦出的創作火花及影響，皆有詳細的觀察撰述。此潮流下的新式英國房舍，從外到裡、從花園圍籬到家具、地毯、壁紙、天花板、彩繪玻璃等，為當時數量正在快速成長的中產階級家庭提供了精緻生活的各種可能性。See Hermann Muthesius, *Das Englische Haus*–Band 1: *Entwicklung, Bedingungen, Anlage, Aufbau, Einrichtung und Innenraum* (Berlin: Ernst Wasmuth Verlag, 1908), 147–50.

51 Muthesius, *Das Englische Haus*–Band 1, 213–14.

52 Teresa Marie Harris, “The German Garden City Movement: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1902–1931” (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2), 31–32.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都會綠地與勞工階級

都會綠地可以提高生活水平，提供維持個人身心健康所需的陽光、空氣與戶外空間，是威瑪時期新一代建築師與都會規劃師所重視的，講求建築設計務實功能而非裝飾效用的新客觀主義（*Neue Sachlichkeit*）的展現。20 世紀初的柏林，有著高度工業化、人口過度快速聚集的缺點。1925 年成為柏林市政府主導總體柏林都市規劃的首席都市規劃師馬丁・華格納（Martin Wagner, 1885–1957），在其 1915 年完成的博士論文〈都市的健康綠地〉（"Das Sanitäre Grün der Städte"）中，即曾透過科學數據的蒐集，深度探討柏林都市區域裡花園、公園等自然與綠地空間對於現代居民健康的重要性。[53]華格納的論文成功地蒐集科學數據，建立起廣大工人大眾健康與綠地間的客觀連結，同時強調透過法令確保現代都市中維持一定比例的綠地空間，是讓都會大眾保持健康的關鍵。這個理念在華格納擔任柏林首席都市規劃師以後，得到更大的發揮和關注，也因此，如何確保中產階級與廣大的工人階級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近綠地，成為後續同樣信仰的德國左派、社會主義規劃師的設計重點與關懷。[54]

德國中產階級與勞工階級間的關係，在 20 紀前期乃至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是一直存續著的重大難題，工人階級在資本市場上被過度剝削以及長期失業問題；而當時甫出現的新興中產階級，則在都會中逐步展現空間話語權，尤其是公共空間的規劃與使用。華格納在 1920 年代推出的「新住宅建設」（*Neues Bauen*）計畫，即為重新規劃都會空間的指標性概念與社會住宅提案，除了家戶住宅的設計，更涉及鄰近社區公共空間的運用。此計畫透過花園城市的理想，以及兼顧採光、座向、通風、汲水點、綠地空間的配置等科學理性條件的客觀評估設計，改善下層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居住品質。

---

53 Martin Wagner, *Das Sanitäre Grün der Städte: Ein Beitrag zur Freiflächentheorie* (Berlin: C. Heymann, 1915), 55–56.

54 Tim Mason,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Essays by Tim Mason*, ed. Jane Capla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33–3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時期最為知名的是布魯諾・陶德（Bruno Taut, 1880–1938）與其他新生代現代主義建築師所設計的「湯姆叔叔的小屋」（Siedlung Onkel Tom's Hütte, 1926–1931）、馬蹄鐵型聚落（Hufeisensiedlungen, 1926–1932），[55]這些充滿「田園城市風」理想性的社會住宅，備受後世讚頌。但較不為人知的是，在建造過程中，為了積極（相當程度頗具侵略性）執行都市改革計畫，柏林市政府大規模收購了廣大貧窮社區的花園聚落（或者田園聚落 garden colony）。根據柏林市政府統計室的資料（*Statistisches Amt der Stadt Berlin*），這樣的聚落在威瑪政府初期有 5,793 公頃，佔大柏林區域土地面積的 6.5%，但在 1925–1929 年間的都市規劃發展裡，消失了近四分之一，剩下 4,448 公頃。[56]這種花園聚落又稱為施雷貝爾花園（*Schrebergarten* 或 *Kleingarten*），1860 年代在德國蔚為風潮，原先是莫里茨・施雷貝爾（Moritz Schreber, 1808–1861）醫生提倡的，為透過戶外勞動提升個人身體健康所設計的小花園住宅（allotment），可種植食物或者其他供觀賞、非商業用的植物，甚至畜養一些牲口。

這樣的設計，到了 20 世紀初期，演變為都會無產階級的低廉生活空間。這些田園聚落位於都會外圍的便宜土地，是甫從鄉下遷徙到都會的貧窮人口的家園，且型態與他們剛離開的鄉村生活最為接近。花園聚落是都會無產階級逃開工廠烏煙瘴氣和居住品質惡劣的貧民窟石牆之少數替代品。但是這一點微薄低廉的嚮往，支持社會主義的左派政府竟然無法容忍，這也激化了不同左翼政黨間的緊張關係，當時支持德國共產黨的刊物《紅旗》（*Die Rote Fahne*）便批判柏林社會民主黨主政的市議會，認為此舉是為了中產階級「蓋車庫」，而犧牲了他們辛勤耕耘開發的綠地與土壤。[57]

55 Mark Hobbs, "'Farmers on Notice': The Threat Faced by Weimar Berlin's Garden Colonies in the Face of the City's Neues Bauen Housing Programme," *Urban History* 39, no. 2 (March 2012): 264.

56 Hobbs, "'Farmers on Notice,'" 264–65.

57 Hobbs, "'Farmers on Notice,'" 2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面上，市政當局對於每個都市空間綠化的規劃皆以市民最大利益為優先考量，但實際上複雜的政治、經濟角力往往左右對於自然綠化空間的態度，這樣的狀況在君權、民主與獨裁制度下皆然，柏林就是最好的見證。[58] 1920 年甫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打擊的柏林，面對各式革命和政治鬥爭所造成的混亂，這座城市視危機為轉機，於當年 4 月透過普魯士憲政會議進行行政組織改造，正式將周遭尚未大幅度開發的郊區併入柏林，創造了大柏林行政區域。[59]合併過程並不是完全未遭遇負面意見的阻礙，但此舉不僅讓柏林因人口增加到 400 萬而更具都會實力，也併入了較為富裕且綠地面積充足的鄰近區域，讓柏林擺脫環境惡劣的工業城市，朝綠地充足的大都會更邁進一步。1924 到 1929 年間，柏林市政廳具高度前瞻性、有計畫地大面積購置土地，以擴張其都市綠地，但這樣的發展在 1929 年世界性經濟大蕭條的打擊下而瓦解。[60]

納粹第三帝國時期，阿伯特・史匹爾（Albert Speer, 1905–1981）的大柏林改造計畫，除了具有宏偉紀念性，對於綠化區域的規劃，大半承繼了 1920 年代華格納的概念，盡可能擴大綠地空間，甚至有將大柏林打造成「公園與運動之城」（*Stadt der Parks und Sportstaetten*）的說法。[61] 在柏林西面創造片片森林相連、名為「綠森林」（*Grünewald*）的公園綠地；這樣在首都西側大範圍綠化規劃，供公眾使用，亦是納粹黨實踐照顧廣大貧苦德國工人階級的代表性樣板政策。此一規劃的確在第三帝國時期已有部分開始建設執行，但最終也因戰爭與政權終了，而無法確認政策後續是否能如實兌現。

58 Barry A. Jackisch, “The Nature of Berlin: Green Space and Visions of a New German Capital, 1900–45,”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 no. 2 (June 2014): 308.

59 Jackisch, “The Nature of Berlin,” 313–14.

60 Jackisch, “The Nature of Berlin,” 316. See also Werner Hegemann, *Das Steinerne Berlin* (Berlin: Vieweg, 197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0).

61 Bundesarchiv, Beriln-Lichterfelde, Akt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artei-Korrespondenz*, April 16, 1939, BA R4606/1592, 33–34.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回顧西方都會理論最蓬勃且最具理想性的 19 世紀末，研究都會與城鄉兩極化發展問題的社會改革者與都會規劃師，如英國威爾斯的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 1775–1858）、英格蘭的愛班尼茲·霍華德（Ebenezer Howard, 1850–1928）、蘇格蘭的派翠克·基達斯（Patrick Geddes, 1854–1932）等，他們所提出的都會發展理論，皆有著不少結合現代科技與人類社會需求的數據計算與浪漫理想模式。但真實景況則是，20 世紀中期以降的多數都市規劃師與改革者，往往屈從於政府官僚機制、技術資源限制與房地產壓力，現代都會中難能可貴的自然空間，如花園、公園等建置大幅被壓縮，甚至成為奢求。都會中的綠樹本身是否為自然？這是另一個層次的討論，但它已是都會熙攘人潮可接近自然的最低選項（as good as one can get），連這樣的選項都已是奢求，凸顯都會與自然間的距離愈發遙不可及。反觀獨裁極權的納粹黨之眾多政策中，有不少不僅對國計民生有助益，甚至在政策方向與用心程度大幅超越其所取代的威瑪政府。因此，若要完整地理解納粹主義的邪惡，就不能全盤否定其曾經可能嘗試過的正面政策貢獻。再者，希特勒帶領的納粹政權，所祭出的各項政令和關鍵理念，並非納粹黨員從無到有、突發奇想而來的創見，它們絕大多數奠基於德國長年以來歷經反覆辯證及研究的政策、社會價值與科學研究成果。

自然與社會、自然與現代都會文明間，有著相扶相助的共生關係，總體而言，人類在現代文明發展的進程中，從未（能）脫離自然而居。在宏觀層次上，從「征服自然」到「捍衛自然」，德語系邦國在擁抱科技工業化的硬體建設與經濟成果的同時，面對愛護德國原鄉自然生態的國族主義，天秤的一邊是工商業鉅子，另一邊則是封建舊制度下的容克（Junker）地主與保家衛國的軍系勢力；站在中間的都會中產階級，或前衛，或保守，只要他們略為傾向任何一方，都將左右國政與民意潮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威廉時期、威瑪共和到納粹德國的歷史發展就是最好的寫照。而在微觀層次，具高度理想性的都市規劃理論師與改革者，他們之中或許多數對現代文明成果持負面批判看法，企圖透過人為規劃與綠化，找回現代環境與自然間的良好平衡，也藉此讓人們重尋兼顧精神與身體的健康快樂生活。而擁護現代都會文化特質者，則在都會的公園與花園綠地建置，以及大自然的山川原野溪流之間，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找尋一直存在、從未消失、且與自然有著緊密連結的有機生命力。

2024 年夏天，在德國國內與國際上人氣與聲望俱優的「舊國家畫廊」（Alte Nationalgalerie），以「無限風景」（Infinite Landscapes）[62]為副標，舉辦了一場浪漫主義繪畫大師弗里德里希的大展，德國觀眾回應熱烈，位於柏林博物館島核心的畫廊外，鎮日排滿欲購票入內參觀的民眾。這是浪漫主義風格歷經 1930 年代國族主義挪用災變[63]後的首度大型回歸，讓德國社會徘徊在懷舊、鄉愁、自我追尋與檢視間五味雜陳。這場展覽的展品多數為弗里德里希早期未成名時的作品，用這些作品勾勒出弗里德里希以大自然觀察與歌頌者自居的畫家一生志業，以及其繪畫技法上的堅持。無獨有偶，另一個藝術展覽界翹楚——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25 年春季也以《自然的靈魂》（The Soul

62 2024 年適逢弗里德里希 250 歲冥誕，德國柏林舊國家畫廊舉辦《卡斯柏・大衛・弗里德里希：無限風景（Caspar David Friedrich: Infinite Landscapes）》大展，展期自 2024 年 4 月 19 日到 8 月 4 日。本人 2024 年 6 月赴柏林藝術學院（Akademie der Künste Berlin）檔案館蒐集研究資料時，有幸親訪觀展。展覽匯集 60 多件以往較不常被討論的弗里德里希各期作品，極受德國民眾熱愛，讓人再次感受到睽違已久的德國社會熱愛浪漫山水作品與相關議題的風潮。

63 弗里德里希寄情於日耳曼山水，捕捉其壯觀俊秀的精神與特質繪入作品，此特質在拿破崙摧毀神聖羅馬帝國以後，轉化為北歐的、日耳曼的、凱爾特的（Celtic）文化認同與愛國意識之表現。此後浪漫主義與國族主義以弗里德里希作品為媒介攜手合作的現象，持續出現在德意志文化語境中，這一點在 20 世紀初期已現端倪，納粹黨奪權以後，強勢發展的右派勢力更借用其作品擴大論述。見 Victor H. Miesel, “Philipp Otto Runge, Caspar David Friedrich and Romantic Nationalism,”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Bulletin* 33, no. 3 (October 1972): 39–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f Nature）為題，在北美洲揭開當今社會探索並重新定義與自然關係的序曲。在 21 世紀大自然與其所乘載的資源皆已過度被挖掘與開發的狀態下，現代都會與自然間關係的歷史過往、張力滿滿的當下、以及未來的存續，不能再只是各方絮絮叨叨的叫囂與各執一詞的爭辯，只有重新回到現代文明發展脈絡中進行深度剖析與理解後，才有機會以文明的方式提供解套的可能。自然與工業現代文明間的難題，不是歐美或西方文明的問題，而是一個全球困境。

*本研究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8-2410-H-194-006）的一部分。特別感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自 2021 年起持續舉辦的〈藝術史與科學史跨領域工作坊〉，以及所有成員的精彩提問與激勵，同時感謝匿名審查委員的修改建議。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吳昌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Benjamin, Walter.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lated by Edmund Jephcott and Kingsley Shorter.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9.

Bloch, Ernst. “Berlin, as Viewed from the Landscape.” In *Literary Essays*, translated by Andrew Joron and others, 361–66.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eriln, Southern City (*Das südliche Berlin*, 1915–16).” In Whyte and Frisby, *Metropolis Berlin: 1880–1940*, 46–48.

——. “Berlin after Two Years (*Berlin nach zwei Jahren*, 1928).” In Whyte and Frisby, *Metropolis Berlin: 1880–1940*, 379–81.

Bölsche, Wilhelm. *Von Sonnen und Sonnenstäubchen: Kosmische Wanderungen.* Berlin: Georg Bondi, 1903.

——. *Das Liebesleben in der Natur: eine Entsickelungsgeschichte der Liebe*. online edition. Jena: Eugen Diederichs, 1921. Accessed July 5, 2023, https://www.biodiversitylibrary.org/item/270104#page/1/mode/1up.

Bundesarchiv, Berlin-Lichterfelde, Akt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Partei-Korrespondenz*, April 16, 1939, BA R4606/1592.

Döblin, Alfred. “Berlin.” In Whyte and Frisby, *Metropolis Berlin: 1880–1940*, 379–81.

Hegemann, Werner. *Das Steinerne Berlin.* Berlin: Vieweg, 197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0.

Huxley, Thomas Henry. “Goethe’s Reflection on Nature.” *Nature*, no. 129 (March 1932): 425–26.

Muthesius, Hermann. *Das Englische Haus* – Band 1: *Entwicklung, Bedingungen, Anlage, Aufbau, Einrichtung und Innenraum.* Berlin: Ernst Wasmuth Verlag, 1908.

Wagner, Martin. *Das Sanitäre Grün der Städte: Ein Beitrag zur Freiflächentheorie.* Berlin: C. Heymann, 1915.

Whyte, Iain Boyd, and David Frisby, eds. *Metropolis Berlin: 1880–1940*.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二、近人研究

Bartels, Elizabeth Heekin. “Berlin’s Tiergarten: Evolution of An Urban Park.” *The Journal of Garden History* 2, no. 2 (1982): 143–74.

Blackbourn, David. *The Conquest of Nature: Water, Landscap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6. 中譯本：大衛・布拉克伯恩著，胡宗香譯，《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現代德國的形成》。新北：衛城出版公司，2018。

Brantz, Dorothee. “The Natural Space of Modernity: A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on (Urb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Historians and Natur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Ursula Lehmkuhl and Hermann Wellenreuther, 195–225. Oxford: Berg Publishers, 2007.

Brüggemeier, Franz-Josef, Mark Cioc, and Thomas Zeller, eds. *How Green Were the Nazis?: Nature, Environment, and Nation in the Third Reich*.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5.

Closmann, Charles. "Legalizing a Volksgemeinschaft: Nazi Germanys Reich Nature Protection Law of 1935." In Brüggemeier, Cioc, and Zeller, *How Green Were the Nazis?*, 18–42.

Dennis, Richard. *Cities in Modernity: Representations and Productions of Metropolitan Space, 184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Dierig, Sven, Jens Lachmund, and J. Andrew Mendelsohn. "Introduction: Toward an Urban History of Science." *Osiris*, no. 18 (July 2003): 1–19.

Gudermann, Rita. "Conviction and Constraint: Hydraulic Engineers and Agricultural Amelioration Projects in Nineteenth-Century Prussia." In *Germany's Nature: Cultural Landscape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Thomas Lekan and Thomas Zeller, 33–54.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rris, Teresa Marie. "The German Garden City Movement: Architecture, Politics and Urban Transformation, 1902–1931." Ph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2012.

Hobbs, Mark. "'Farmers on Notice': The Threat Faced by Weimar Berlin's Garden Colonies in the Face of the City's Neues Bauen Housing Programme." *Urban History* 39, no. 2 (March 2012): 263–84.

Hough, Michael, and Judy Hanks-Henn. "Nature and the Ci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gazine* 79, no. 7 (September 1989): 40–43.

Jackisch, Barry A. "The Nature of Berlin: Green Space and Visions of a New German Capital, 1900–45."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47, no. 2 (June 2014): 307–33.

Klemek, Christopher. *The Transatlantic Collapse of Urban Renewal: Postwar Urbanism from New York to Berli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Köhler, Marcus. "Brownian Gardens in Germany." *Garden History* 44, supplement 1 (Autumn 2016): 159–74.

Lees, Andrew. *Cities Perceived: Urban Societ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20–1940*. Brattleboro: Echo Point Books & Media, 2014; first edition in 1985.

Lekan, Thomas M. *Imagining the Nation in Nature: Landscape Preservation and German Identity, 1885–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It Shall Be the Whole Landscape!' The Reich Nature Protection Law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the Third Reich." In Brüggemeier, Cioc, and Zeller, *How Green Were the Nazis?*, 73–100.

Mason, Tim. *Nazism, Fascism, and the Working Class: Essays by Tim Mason*. Edited by Jane Capla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iesel, Victor H. “Philipp Otto Runge, Caspar David Friedrich and Romantic Nationalism.”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Bulletin* 33, no. 3 (October 1972): 37–51.

Mumford, Lewis. *The Culture of Cities.* San Diago;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Oelschlaeger, Max. *The Idea of Wilderness: From Prehistory to the Age of Ecolog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aenhuysen, An. “Berlin in Pictures: Weimar City and the Loss of Landscape.” *New German Critique* 37, no. 1 (February 2010): 1–25.

Paulin, Roger. *From Goethe to Gundolf: Essays on Germ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ambridge: Open Book Publishers, 2021. https://metadata.openedition.org/handle/20.500.13089/4625.

Phillips, Denise. “Friends of Nature: Urban Sociability and Regional Natural History in Dresden, 1800–1850.” *Osiris*, no. 18 (July 2003): 43–59.

Rave, Paul Ortwin. *Gärten der Goethezeit.* Berlin: Henssel, 1981.

Rewald, Sabine. “Caspar David Friedrich’s ‘Window with a View’: A Mystery Solved.”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134, no. 1070 (May 1992): 299–304.

Robertson, Ritchie. *Goeth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Schama, Simon. *Landscape and Mem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6.

Umbach, Maiken. *German Cities and Bourgeois Modernism, 1890–1924*.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Wilson, Jeffrey K. *The German Forest: Nature, Identity and the Contestation of a National Symbol, 1871–1914*.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Wolschke-Bulmahn, Joachim. “All of Germany A Garden?: Changing Ideas of Wilderness in German Garden Design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Nature in German History*, edited by Christof Mauch, 74–92. New York,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04.

三、網路資源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Natur und Kunst.” *Gedichte 7 Nur die Besten*（德國線上詩集網站）. Accessed Sep. 30, 2022. https://www.gedichte-lyrik-online.de/natur-und-kunst -sie-scheinen-sich-zu-fliehen.html.

Hannecke, Paul. *Photographische Mitteilungen, Halbmonatschrift für Amateur-Photographie*, Jahrgang 40 (1903), Rijks Studio（荷蘭國家博物館線上圖像資料庫）, 38–39. Accessed Sep. 26, 2024. http://Rijksmuseum.nl/nl/collectie/RP-F-2001-7-1184B-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5 (Jun. 2025), pp.177–212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506_(75).0004

Nature and Modern Urban Culture in Germany —The Case of the Metropolis Berli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uo, Hsiu-ling*

Abstract

Germans believed that there wa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eople and nature. Such thoughts not only appeared in medieval legends, but also were manifested in various ways in the modern era. The idea of "conquering nature" has never been abs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that have attracted the most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forma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country such as Germany is a process of actively re-defining and re-adjusting its relation with nature, which includes, from the 17th century onwards, the use of modern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Prussia to tame rivers, forests, and wetlands, and to build roads, bridges, factories, houses, and to carry out urban development and cater to commercial interest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Napoleonic Wars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is attitude towards nature turned into an appeal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 "protecting nature" supported by the *Heimatschutz* movements, which emerged in the national movement effectively as a part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themes of protecting the fatherland and national identity were constantly appropriated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No. 168, Sec. 1, University Rd., Minhsiung, Chiayi 621301, Taiwan, R.O.C.;
E-mail: hishlk@cc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produced in the Nazi political propaganda of the Third Reic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is phenomenon made the sometimes ambiguous, harmonious, and sometimes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ities and nature even more complicated. Inevitably, the city sometimes lives on nature and sometimes plunders it. Amid the jungle of buildings in the booming modern German cities, how was the boundary between nature and city defined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urban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Keywords: German modern city, urban green space, nature, wilderness, national identity, natural protec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